

澳門是多元文化社會的典範？*

Francisco Pelicano Antunes**

一、自我認同與多元文化

在工商業、通訊和文化的全球化進程勢不可擋，移民浪潮高漲，國家與經濟相互依賴日趨深化的今天，多樣化成為一個尋常話題。

當今以全球為題的話語將世界看作遼闊而多樣的“唯一支配者”（Kahn, 1995, p.IX）。我們正生活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的猶疑時代，一個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價值觀急劇變化，社會變革劇烈程度超乎想像的時代。時代的斷裂與重組要求我們必須應對一個充滿了偶然性、悖論和“雜亂無章”的現代社會。其主流特徵挑戰了我們傳統的表述方式，尤其是個體和民族的自我認同感以及看待世界和我們自己的角度。

西方歷史上廣泛存在的普世主義反復出現在思想和理念的變遷及其所使用的話語之中。人類與“他者”的接觸在人類社會處於萌芽狀態時，將他者內化的過程中就已存在。商業與文化（跨文化）的交流與人類歷史一樣古老（Cabral, 1998, p.5）。多元文化之所以能夠代表現代社會的標誌取決於用以界定和描繪當下現實社會的術語和概念。

西方文明中“他異性”的話語以及通過它而建構起來的世界觀早已為我們熟知。儘管如此，我們仍然把“他者”文化看作是一個存在於我們之外的實體，並因此認為人文的含義是多樣化的，是分散在多重雜糅的文化之中的。時下語境中頗受關注的文化差異不僅是某種話語的標誌，更是在社會中求生存和在社會找尋共鳴的一種方式。這

* 本文原稿曾在第一屆“葡文研討會——文化間對話”宣讀，莫三比克馬普多，2004年6月7—12日。

** 澳門大學教授。

種方式正呼應了那句套話“差異至上”。筆者不禁聯想到上世紀八十年代的英文標語。

讚揚多樣性，接受和消費差異性不僅是單一性/他異性的問題，而且是時下的焦點問題。Kahn認為我們生活的“世界的特徵並非只有差異性，而且還包括對差異性所持有的一種消費主義的熱情和瘋狂的迷戀。”（Kahn, 1995, p.125）。Lages認為：

“當今人類的問題是在一種稱得上是多元化的狀態下接受多重引導。公共領域不再是認同感所參考的唯一或主要場所。人遷移至異地所獲取的參考並非僅限物質層面，還包括在異地接觸的觀念、標誌、動因和不容忽視的行為舉止差異。”（1997, p.12）。

如今的世界被比作“聲音不和諧”的世界，它要求人們掌握比傳統方式更複雜的知識，同時接受各種各樣的世界觀。

1980年代以來一些國家主動選擇多元文化作為其社會的特徵。這一現象不僅是對傳統文化單一性的背叛，同時也是對大城市多樣性特點的反映，如歐洲、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的城市，非洲國家最具世界性的城市（如馬普多和南非新民主共和國的主要城市），亞洲城市（澳門、香港和新加坡）。此外，它還表明一種接受他異性和多樣性的新觀念正在確立。這一觀念在某種程度上加快了“其他文化”概念的消亡，促進了另一種觀念的建立，即“一種激進的他異性”（Levinas, citado em Kahn, 1995, p.46）。費爾南多·佩索亞早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就提出，寓居在同一個人物中的多個實體是複雜、多樣和支離破碎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化性“異質”一定會在當代思想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Bauman持同樣的觀點。他認為：

“自我認同如今變成了一種自由選擇的遊戲，‘自我’的戲劇化表達。”

“……假如現代主義的‘自我認同問題’是建立一種確定且穩定的認同感，那麼後現代主義的‘自我認同問題’則盡量避免固定，同時對反對面持開放的態度。”（1996, p.18）

假如當下“人”的形象是一個“被分享的人”（Lages, 1997, p.12），擁有不確定的認同感，那麼這種理解並未取消“認同感”的概

念，而是對其進行重構和重新定義，儘管具體的方式受認識和預測的限制而尚未明瞭。Bauman則指出，認同感“從來沒有成為一個問題。它總是作為一個問題而出現。”（Bauman, 1996, p.19）

艾德蒙·雅貝認為沒有人“進入沙漠的目的是為了尋找自我認同，而是恰恰相反，為了丟棄人格，變成一個無名氏。”（citados em Bauman, 1996, p.20）。自我認同也許必須以一種貌似悖謬的方式通過自我丟棄而“重獲自我”。

在個體不斷尋找自身生活的意義和整個世界的意義的過程中，“沙漠”是一處充滿各種可能性的地方，一處自我創造的天地，在這裏，個體通過把自己轉化為客觀對象而鑑明自身。

二、澳門是多元文化社會的典範？

澳門自十六世紀成為葡中兩國的國際貿易港口，逐漸形成了世界性的規模。她在連接中國、日本、菲律賓和馬來群島之間的絲綢、瓷器、金銀和香料貿易中具有戰略地位。澳門這塊自治區域不僅是貨物進出口的口岸，而且是西方與東方技術交流，漢籍與歐洲書籍的傳播與交流的中心，吸引不同語言、種族和文化背景的人們滙聚於此，因此，澳門也是風俗、思想和價值觀相互影響的區域。（Barreto, 1997）

十六至十七世紀貿易和文化的頻繁接觸使澳門成為一個集普適性、種族混合、多種語言和多元文化為一體的社會。這些特點有利於不同語言在日常生活中相互翻譯和習得。假如說語言的習得是與貿易與通訊的大量交流與多方需求同步發展起來的，帶有極大的實用性，即“生存”目的，那麼，知識層面同樣經歷了相應的跨語言活動，尤其是耶穌會所做的工作以及他們所開設的學校內部相關的諸多歐—中團體。在這種頻繁交往的多種語言和多元文化背景下有三個標誌性和先鋒式的例證（Barreto, 1997）值得一提：1583至1588年左右編纂的葡漢辭典，耶穌會士出版的漢語和歐洲語言叢書，1572年建立的高等教育機構聖保祿學院，享譽整個天主教亞洲範圍。

自建成初期澳門便傾向於依據司法、政治和制度原則而治。從主權的角度來看，極度實用主義和眾多利益群體共存的現實造成澳門的領土身份總是模稜兩可。其自治理念總是高於中國皇帝的權力或葡萄牙國王的權力。

澳門被認為是處在葡萄牙行政管轄下的中國領土，（幾個世紀內幾乎一成不變），與葡屬亞洲的其他城市相比它擁有一種特殊的地位：自治城市，以歐洲為主體，建立在中國土地之上。1586年葡屬印度總督梅內塞思（Duarde de Meneses）授予澳門城市榮銜，“中國澳門港上帝聖名之城”（Jesus, 1990, p.54）。這一稱號首次確認了澳門的自治權。

葡中司法權，政治一體制權共存的特點貫穿澳門自治歷史的始終。在此葡萄牙與中國的權力彼此分割。

政治、司法和語言的多樣性，知識的交流，繁榮的商業活動和文化交融造就了歷史上澳門的個性。這些個性體現在澳門教育結構上，反之亦然，澳門教育結構的特點也反映了社會的世界性多樣化特點。如今澳門大致存在四種教育模式：中華人民共和國式、臺灣式、葡萄牙式和安格魯—撒克遜（香港）式。

歷史上的邊緣化狀況¹鑄就了澳門多元文化社會的認同感。把澳門與世界其他口岸區別開來的關鍵在於五百年以來，澳門保持了自其建成之日起所形成的特色：政治文化自治的特殊群體。

眾所週知，“不同文化共同生存，互相尊重，彼此寬容”（Ngai, 1997, p.65）的精神主宰著澳門的發展。然而，比文字更具代表性的是日常生活中對西方與東方文化的詮釋，即靈魂；Michel Butor稱之為——筆者記得叫作——“地方精神”。澳門人在復活節期間參加揹負十字架巡遊的活動，在農曆新年期間祭祀女神阿媽。阿媽被譽為漁民與水手的保護神，據說也是澳門名稱的起源。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很難

1. 費爾南多·佩索亞或許會用“超越邊界的邊界”。艾德蒙·雅貝作品中常用的意象“沙漠”：“曾經，沙漠是我的故鄉，現在，沙漠是我的旅途，我在此流浪。”

見得到全體社會成員慶祝東西方最具特色的節日，卻獨立於其中任何一種文化。也很難看得到主教與僧人同時出席某座公共建築的奠基儀式並為之祈禱。

影像與標誌在當今社會佔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一個社會群體的多元化特徵通過影像和標誌得以表達。似乎沒有哪座城市比澳門更有資格稱自己是一座普世中心、卓越的混合體和顯著的標誌，恰如其分地表達自身構建文化多元和跨文化的歷史。

相對於葡萄牙和中國中央政權和機構，澳門根據自治管理的邊緣化位置和相對靈活的狀態發展出內與外，近與遠的概念，樹立了區域的意識，因此也構建起空間特色來。這些概念有利於培養群體的觀念，即公民權意識。

當下全球化理論討論“國家—民族”關係所舉出的自我認同、公民權與傳統文化，諸如此類的問題，筆者認為，澳門早在四百年前就已經歷過。在特殊性和世界性的張力作用下，多重勢力、不確定因素和各個流派在澳門匯聚一處。

與當今那些佔據統治地位的代表性和中央集權性的力量相比，實際上是那些經由實情和實用主義的標準篩選出的反中央集權性聯盟社團在有效地協調澳門各界的需求。它們更加符合澳門的邊緣化狀態，並且至少在地方寡頭階層中建立起了一種為全體目標而共同參與的公民權觀念。

被稱為“商人共和國”（*Thomaz e Lessa, citados em Hespanha, 1995, p.22*）的澳門擁有多元文化世俗生活的豐富經驗，這一特色的顯現遠遠早於後現代主義提出其核心理論。儘管未來城市模式究竟如何難以預料，但是四百年前澳門的歷史或許可以提供建設參考。

在這塊特殊區域，那些團體並非是非此即彼的關係，而是在保持獨立性的同時縱生交錯。在一座“優秀城市”，人們經過不同區域渾然不覺。典範城市生活的理想標準中，邊界綫是開放和沒有盡頭的。

（*Young, citado em Rogers, 1998, p.235*）

澳門的邊緣化狀態使她“總是居於兩條邊界綫之間，或是處在邊界綫和多條邊界綫的吸引力之間。超越邊界²”。這個特點培養了她的複雜性和多元化的開放心態。假如文化間的生存狀態真如Hale所指出的那樣——“起源於失落的體驗”（citado em Bond, 1991, p.V），那麼澳門早已在選擇無邊疆界，接受“他者”的過程中丟棄了自我。這就是“沙漠”的比喻，用來指代人們對自我邊界的重新設定。

2. 艾德蒙·雅貝，L'Eau。